

《李宗仁回忆录》的撰写人唐德刚先生认为：《李宗仁回忆录》“在中国近代史传记项下，是一部鲜有其匹、全始全终的‘当国者’的自述。”

传主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记的价值。李宗仁的地位决定了《李宗仁回忆录》的重大价值。毛泽东就曾关注过这本书的英文本，并请有关单位译成中文。不过，毛泽东是否读过这本书，不得而知。

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最有价值的地方可能不是历史人物的历史，而是历史人物的心史。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而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如果他不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能完全无迹可循。在这方面，《李宗仁回忆录》确实有其他中国现代领袖传记不可取代的地方，它保留了许多李宗仁对他同时代人物如蒋介石、汪精卫的情感态度，可以真实地看到李宗仁究竟亲近谁、疏远谁，对什么人欣赏器重，对什么人不以为然。这些情感心理一般不会在常规的史书中看到，也很难在别人写的传记中得到真切的表达，而《李宗仁回忆录》，在这个方面得天独厚。

比如，《李宗仁回忆录》就涉及大量对蒋介石的品评。品评这个词与评价这个词不完全相同，它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它关注的也不仅是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历史功过这些问题，同时也关注历史人物的个性格、个人素质以及道德品质、价值取向等问题。由于这部回忆录的作者与这些历史人物长期“亲密接触”，因此，他的回忆会更生动、更具体、更感性、更有趣，不像有的历史著作那样抽象乏味、大而无边。像书中回忆 1937 年的上海、南京保卫战，就对蒋介石的指挥失当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意气用事，二是对国际形势判断错误，三是不懂兵法，逞匹夫之勇。这里的意气用事和匹夫之勇说的都是蒋介石的性格气质、情感心理，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回忆，断不可能如此细腻、生动。所以，就回忆录的特点而言，它不仅可以书写“大历史”，而且可能还原“小历史”。这个“小”不是渺小的意思，而是贴近了历史的细部，注意了历史的细节，不仅有历史的性质，而且有文学的意蕴。

▼人物志

留点有意义的给孩子

□ 纤 文



《国运 1909》，(澳)雪珥 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2 月出版

看到了“欲速则不达”及“南辕北辙”的荒诞和哀伤。《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以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根基，在改革之真义及中国国民性上作了深度诠释。

雪珥从来不愿意将自己当文人，尽管他的文字风靡海峡两岸。他也对那些“专家、学者”的头衔不十分“感冒”，他刻意地保持了低调，很多“雪米”连他的性别也不清楚。他也刻意地对历史的“圈内”人数而远之，如同个体户。他给自己的定位是“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从那些长期被国内研究者忽视的海外史料中，寻找中国近代史的闪光碎片。

“非职业”，是说雪珥并非靠写作为生。他其实是个商人，下海十多年，一直在玩金融与地产，历史研究与写作无非是业余爱好而已。身处权力、资本乃至各种旁门左道的激烈博弈，既令他对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深有体会——我们在他对历史的解剖中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亲切”的现实感与现场感，也促使他在闲暇时潜心写作以求暂时躲避名利场的喧嚣，更成为他刻意低调以便在自己的职业和爱好之间建立尽可能坚固的“防火墙”。

雪珥的历史博客刚开就受到关注,《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2007 年 1 月在海峡两岸的《传记文学》和《国家历史》上同步发表。《传记文学》随即开始以半年时间连载雪珥的专著《大东亚的沉没》，首度从引发甲午战争的高升号事件入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重述甲午战争。《大东亚的沉没》出版后，雪珥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了肯定，但他却并没有走小众的学术之路，而是将自己定位为“历史现场的记者”，继续在大众传媒上传播他的独到研究与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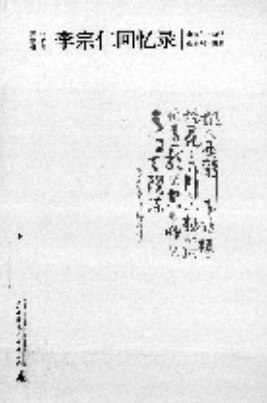
这之后，他相继在《国家历史》杂志、《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新财经》杂志等开设专栏，钩沉历史，直指当下。雪珥的历史写作，不仅以独特的史料见长，他自己搜集的大量的海外史料，经常令读者耳目一新；而且以独特的史识见长，全力还原被神化及妖魔化的历史真相。他自身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切身体验及思考，令他的作品有了浓烈的“资治通鉴”意义。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后，他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两整版的长篇，讲述了澳大利亚是导致中国五四运动的间接原因；在中国派遣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时，他在《国家历史》杂志发表了两篇万言长篇，介绍了鲜为人知的中国海盗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并认为错过“成为海盗”及“打击海盗”是中国海权沦丧的标志；在朝核危机期间，他在《中国经营报》上发表了三整版的长篇，介绍晚清历史上朝鲜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并提出了“在一衣带水的背后，依然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他先后受邀在搜狐、网易上开设了博客，在这些网站的大力推广下，雪珥拥有了上百万的读者。

2009 年他在《中国经营报》上开设了“中国 1909”专栏，从年代的横断面，回顾中国百年，拉开了他的改革史写作。在回顾这段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中，雪珥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社会，改革、腐败、上访、炒房、炒股等，不少读者是将此当作现实的一面镜子在读。这个专栏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被广泛转载。2010 年 1 月，图书策划公司博集天卷将这一专栏整理出版，雪珥同时添加了 5 万多字的延伸阅读，这本名为《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成为雪珥的第三部历史著作，也是他的改革史系列著作的第一本。

白天用英文经营生意，晚上用中文回顾历史，他笑称自己是典型的分裂型人格。“没有钱是不行的，但光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不能让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被金钱填满了，我今天就将进入不惑之年，该留点有意义的东西给孩子们”，他说。

本版责编：刘 頔

▼三昧斋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 1 版，2009 年 8 月第 5 次印刷

说到对李宗仁的历史评价，一般可以这样概括：桂系领袖、北伐名将、民族英雄、民主实践者、爱国人士。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民族英雄这个头衔，即李宗仁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一般说到李宗仁与抗日战争，大多数人只知道台儿庄战役。其实，李宗仁还有很多重要的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迹。他并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决战取胜的常胜将军，更是一个未雨绸缪，有预见力、决断力的战略家，而且在政治上同样具有领袖的谋略和气魄。我们不妨介绍几件《李宗仁回忆录》里写到的抗战爆发前的事情，看看李宗仁如何体现了他的战略家、政治家素质。

一是李宗仁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战略。李宗仁早从日本的种种行径判断出日本侵华是早晚的事情。他在 1933 年就发表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焦土抗战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必须利用广大民众、山川险阻等优势条件来困扰敌人，进行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通过坚壁清野、敌后游击战、破坏交通等方式拖垮敌人。“焦土抗战”后来成为抗日战争期间最为流行的悲壮的口号，也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这个

历史与心史

□ 黄伟林

战略正是李宗仁提出的。

二是广西长期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备战工作做得非常好，为抗战预备了大量的兵员。抗战爆发时，广西的常备军只有 14 个团。但因为有“寓兵于农”的政策，广西从 1933 年起实行征兵，新兵训练一年后退伍。抗战爆发时已积累了四届训练有素的退伍士兵，一经动员，农民蜂拥报名入伍。因此，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编成三个军 40 个团开赴前线，开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未有之先例。

三是建立了有效的情报渠道。早在 1933 年前后，日本因为两广抗日意识明确，多方派人拉拢李宗仁，军、政、商、学各界要员到广东李宗仁私宅访问的多至 100 多人。李宗仁利用这个机会与日本军人和知鹰二中佐成为好朋友，还认识了翻译何益之，并策动何益之做了中方的情报员。抗战爆发后，何益之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提供了大量情报，中央军委会所得情报还不及五战区可靠。

四是迁省会到桂林。李宗仁预见抗战即将爆发，觉得广西省会在南宁，距离海口太近，易受敌人威胁，1936 年提出将省会迁回桂林。桂林的好处是避免了敌人海上登陆的威胁，可与中央密切联系，桂林山洞多，天然防空。省会迁到桂林不到半年，抗战就爆发了。

历史人物的回忆录，还有一个重大的价值，就是它不仅还原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而且还提供可能发生的历史。因为历史人物有许多想法，有些想法影响了历史，有些想法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影响历史，但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这

▼争 鸣

中国的精英要站直

□ 孔庆东

2010 年新年伊始，书市上出现了两本令人眸子一亮的好书，一本是韩毓海的《五百年未读著史》，另一本就是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这两本书都是针对当下中国的许多困惑而写的，把这两本书合起来看，就能明白 2008 年、2009 年的中国，并且能够知道 2010 年、2020 年的中国。

《中国站起来》这个书名我很喜欢，这个书名特别有形象感，不是理论化的书名，比如“中国人的精神主体建构”之类，那会很拗口。我就喜欢很有直觉的这种名字，站起来，充满动感。我一下就想到毛泽东 60 年前说的那句话了，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封底推荐语中就写道：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是中华民族精神主体的宣言。

1949 年以前中国人是什么姿态呢？我们现在把地球不是想象成一个村吗，按理说一个村里的老乡们应该是自由地保持各种姿势，这才是一个理想社会。你爱站着站着，爱躺着躺着，爱坐着坐着。可有些人不这么想，有些人在别人坐着或者是躺着的时候他来抢你，他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

中国因为古代过得比较好，家里早早就进入腐败阶段，沙发、椅子一大堆，所以中国人很久就不站着了。开始是坐着，后来嫌坐着还不够舒服，就倒着。我们东北谚语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最舒服的就是倒着吃饺子。中国的晚近社会是全社会都倒着，倒着还不行，倒着吃饺子还不行，还倒着抽大烟。林则徐为什么恨鸦片？挺大一个男人，不管 20 岁 30 岁，躺在床上吸鸦片，他就从这个姿势中看出，这个民族要出大事。

因为倒着的时间太长了，被人



《中国站起来》，摩罗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摩罗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引来媒体热议。我看到这本书很是诧异，这是摩罗的书吗？2009 年圣诞节后，本来就有失语的感觉，看到摩罗《中国站起来》这本书，更让我感到了一些悲凉。真的很难说这是一本书，书中满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绪碎片，所有的论调都是武断而不容商量的。我并不想给摩罗扣上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虽然民族主义者也会表现出摩罗的这些特征；一些狭隘的政治和社会理念，一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爱国情感，一堆充满斗志而缺乏理性的激昂言辞。通常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很少关注社会正义、自由平等这样一些对民众更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议题，而把一切问题简单地归结于外来民族的压制。

我想这个时代任何主义的学者，都不会反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这样一些理念，更不会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然而一个理性的学者，会把文化认同看作是一个延续和变化的过程，而不会视为一种固定不变、僵死的特征。然而，摩罗在书中所表达的所谓“中国文化”，似乎是一个不会发生变化的实体，所以摩罗把力量都用在了对五四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清算上了。

我从摩罗这本书中最初读出的一个词，就是“敌意”。对五四精神的敌意，对西方文化的敌意，包括对鲁迅、胡适和蔡元培这样一些文化先驱的敌意。我不知道这份敌意的来源，如果真如摩罗所言中国站起来了，这份敌意更显得没有由来。这种敌意若是发生在外族侵略和威胁，或是受其他族群压迫的时代，或许我还能理解。然而发

种历史的可能性对历史本身已经无济于事，但它对现实、对未来却可能会有所启迪。比如，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李宗仁是一个战略家、政治家。所举的事例多局限于中国问题。事实上，李宗仁并不仅仅对中国问题和军事问题深谙于心，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战略家。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李宗仁回忆了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其中有两件事非常能显示李宗仁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这两件事都发生在 1944 年。第一件事是李宗仁建议英国不要过早开辟第二战场，应当让德、苏两国拼死纠缠，两败俱伤，然后渔翁得利。如果英国真的采纳了他的建议，战后世界历史的确可能改写。东欧和柏林问题也可能不复存在。第二件事是李宗仁向美国提交的两份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是建议中美两国应及早计划控制东北，以防中共和苏联占据东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是不必要苏联参战，二是提前训练东北接收人员。这两个建议都没有被美国方面接受，李宗仁对世界大势的预测也就只能成为纸上的备忘录，而不是历史的指南针。否则，中国现代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目前，坊间有多种与李宗仁有关的传记作品，如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的《我与李宗仁》、杨树标等人的《李宗仁家事》、张秋实等人的《李宗仁在 1949》、李永铭等人的《桂系三雄》、罗平汉等人的《桂系军阀》，但最好的李宗仁传记仍然是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之所以这样认为，首先是因为李宗仁本人的品德优秀，是少有的质朴平易的政治领袖，他的个人品德决定了他的回忆录的真实性，他的个人修养决定了他的回忆录的丰富性。其次是因为撰写人唐德刚学养的卓越。唐德刚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优秀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李宗仁回忆录》是他用心最深、用力最勤的著作，他的学术修养和学术道德决定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最后是因为这本书从撰写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它的读者不断，而且，读者面越来越广，这本书的阅读史同样证明了它是有学术含量和叙述魅力的李宗仁传记作品。

▼新书品荐



《裁量正义》，(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 著，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9 月出版

本书考察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在法律终止的情形之下不会出现暴政。更确切地说，核心问题就是倘若要将裁量权之运用所造成的非正义降至最低程度，目前尚未采取但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由于涉及行政正义质与量方面的重要性，裁量的控制堪称“行政法学的歌德巴赫猜想”。戴维斯对裁量正义的讨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精度方面都超过了当时其他同类作品，他提出的基本观念具有弥久的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著作的解读也应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闻弦歌而知雅意。



《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比利时)居伊·伏思达 著，新星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欧元诞生十年来，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又逢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欧洲如何在这关键时刻进行抉择和取舍，在世界大范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书中全面介绍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金融危机情况及其来龙去脉，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突破性的解决办法。本书并非经济管理类图书，而是一本普通大众也能看懂的经济类读本。

作者居伊·伏思达，比利时前首相，现任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自由党团主席，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对国际关系、世界经济、金融事务等方面均有深入了解，曾有著作《走向欧洲合众国：一个新欧洲的宣言》在中国出版，在中国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均有广泛影响。



《大师的侧影》，张世林 著，中华书局 2009 年 9 月出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任中华书局《书品》编辑期间，结识了启功、钱锺书、周一良、程千帆等老一辈著名学者，深为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所感动。2008 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华如逝水，这些可敬的文化老人大多已经故世，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也渐渐远去。就在这一年里，作者提笔写下了与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交往，再现了他们朴实而卓越的风采。



《铸就传奇》，(美)斯科特·埃曼 著，文超伟 译，新星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

他是最会折磨人的暴君，他羞辱任何一位演员和工作人员，包括约翰·韦恩、亨利·方达。他成就了西部片，赢得了全世界的观众，却断绝了与儿子的关系。约翰·福特(1894-1973)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但是对于如何拍电影，他不是闪烁其词就是不置一词，他本人则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感情丰富，但又经常显得冷酷而自私；刚正不阿，却满口谎言，没有人知道他哪句是真。

本书作者采访了约翰·福特身边的亲戚朋友，以及曾经共事过的人，最大限度地让读者接近了这位电影史上的巨人，揭开围绕在约翰·福特身上层层的神雾。本书是关于约翰·福特最为详实的一本传记，其价值还不止于此，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诸多著名人士纷纷出现在这本书里，他们与约翰·福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站起来》的敌意和荒唐

□ 叶匡政

生在这个四处宣扬“大国崛起”的今天，更是让人难以理解，我真的不明白这种愤怒来自何方？只有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狭隘的思想情感和知识体系中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愤怒型的清算和革命意识。

首先摩罗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就非常偏颇。摩罗所指责的胡适，一直反对把五四称为启蒙运动，他认为五四是中国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胡适之所以坚称五四是文艺复兴，在意的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革新而非摧毁。至于启蒙运动的提法，强调的则是这场运动的政治意味，那不过是后来历史教科书中的说法，而被摩罗指为“中国精神大崩溃”“旗手”的蔡元培，对传统文化更不是像摩罗说的那么态度决绝，他曾公开说过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诸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蔡元培还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儒家的义、恕、仁。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摩罗还有个提法叫“中国精神大崩溃”，虽然耸人听闻，仍然似是而非。如果中国精神真的大崩溃了，又是什么支撑中国人走到了今天。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当下社会价值观的缺失。由于人们对价值缺乏道德、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认知与判断，使得人们容易将价值简单化、绝对化，很多人衡量价值的标准最后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这也是目前功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但如果原因归结为五四精神和西方殖民者，无疑把账算得太远了。即便是西方文化也是有自身的精神和价值认知体系，如果真的有“中国精神大崩溃”，那么西方的精神和价值认知为何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呢？